

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转向与民粹主义 危机叙事逻辑的演变^{*}

李正东 斯特凡·贝格尔

[内容摘要] 本文围绕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转向展开,旨在揭示其背后的民粹主义危机叙事逻辑及其内在矛盾。选择党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极右翼政党,其崛起依赖于在欧债、难民与能源危机中反复运用“危机化”话语,通过反建制叙事动员社会不满并重塑政治合法性。但这一逻辑也导致内生困境,随着选择党深入体制、获得议会席位,其反体制身份难以维系,从而削弱民粹动员的效力。在意识形态上,选择党由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保守主义,但内部分歧频发,不仅暴露出组织整合力的不足,也凸显其政治转向的脆弱性。本文通过对选择党话语策略与组织演变的分析指出,其政治转向不仅折射出德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张力,更体现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危机时代”中依靠危机叙事进行权力建构的普遍模式。本文认为,选择党的发展逻辑展现出一种典型的合法性悖论:危机叙事赋予其动员力,却也在体制化过程中逐渐消解其政治优势,这一矛盾决定了其未来在德国与欧洲政治中的有限前景。

[关键词] 德国选择党 极右翼 民粹主义 反移民 危机叙事

[作者简介] 李正东,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德〕斯特凡·贝格尔,波鸿鲁尔大学社会运动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6-0078-20

一、引言: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所谓的“民粹主义”最早是在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

^{*} 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安全秩序转型下的中东欧困局及中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5BGJ084)的阶段性成果。

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观，从整体上对平民大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①此后，随着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关注，对此概念的理解逐渐分成了不同的方向，并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例如，费德里科·塔拉戈尼指出，在欧洲和北美，民粹主义研究通常被称为“民粹学”，常常被定义为“非自由”和“反民主”的一种现象。^②另一派则认为存在一种“民主民粹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埃内斯托·拉克劳，他认为“民主民粹主义”可以视为治愈病态民主国家的“补救措施”。^③比利时哲学家尚塔尔·穆菲认为自由主义者由于无法认识到民主社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实际上否认了民主政治本身。相反，其所倡导的民粹主义逻辑能够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出一条敌对的边界，从而否定所谓的“多元主义”。^④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在民主制度内部稳固化，其背后不仅仅是对既有政治精英治理失能的回应，更是对民主制度内在矛盾的一种动员式操控与结构性利用。右翼民粹主义的持续壮大，不仅是因为其善于利用内外危机激发民众的危机感和归属感以获取政治红利，而且更在于它在民主制度的结构性裂缝中，构建起了对民主参与失效和主权话语模糊的系统性回应。这种回应不仅需超越对个别政客人格特质的分析，而且应当被纳入对西方民主运行机制的反思中。因此，民粹主义的扩张并非偶发性的政治现象，而是民主政治危机的结构性投射。民粹主义的发展表明，当建制派政治精英无法回应社会中下层群体的政治诉求时，民粹主义便获得了制度性动员的机会，从而在政治结构的缝隙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种政治运行逻辑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传统。

① 李永志：《简明国际知识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② Federico Tarragoni, “Populism, An Ideology Without History? A New Gene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29, No. 1, 2024, pp. 42 ~ 63.

③ Ernesto Laclau,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in 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Books, 2005, pp. 32 ~ 49.

④ Chantal Mouffe, *For a Left Populism*, London: Verso Books, 2018.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印证了这一发展逻辑,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的兄弟党和荷兰的自由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纷纷崛起,^①并在本国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究竟什么是导致右翼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根源?政治反对派大多是对民粹主义政客的人格缺陷进行批判,而不是将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化研究。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在政治学民主理论中的地位长期以来被系统性地忽视:一方面,在一个日益技术官僚化和广义上“自由”的政治秩序中,作为一种“反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常常被精英阶层嗤之以鼻;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现象,在不同国家的政治语境中的表现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可能体现出相反的政治诉求。^②同时,在当代西欧政治话语中,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发展过程揭示了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精英之间的互动机制。民粹主义通过对主流政治的批判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话语,将制度内部未能回应的社会不安,如文化认同、经济危机与安全焦虑等进行重新叙事化包装。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往往采取“制度内反制度”的策略,在议会政治、法律框架与媒体传播体系中寻求自我合法性,推动其政治议程的常态化与合法化。

当前,在民粹主义于欧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案例。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德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折射出欧洲政治在危机时代的整体右倾化。2025 年 2 月 23 日,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束,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仅次于联盟党,并在多个东部联邦州成为第一大党。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改变了德国传统政党政治的格局,也在欧洲乃至全球引发了对德国右翼政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选择党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德国经历数次危机并进行政策调整中不断获得民众支持的结果。自 2008 年欧债危机以来,

① 田小惠:《法国国民联盟的再转型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2 年第 10 期,第 51~55 页;彭重周:《右翼崛起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基于意大利兄弟党上台的透视》,《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 年第 7 期,第 175~188 页;马晓云、李宁:《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的政策及其影响》,《黑河学院学报》2024 年第 9 期,第 8~10 页。

② Paris Aslanidis, “Is Populism an Ideology? A Refutation and a New Perspec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64, No. 1, 2016, pp. 88~104.

欧洲接连经历了 2014 年难民危机以及 2022 年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在多重危机不断叠加的情况下,选择党逐步将各时期的危机叙事融入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中。其政治话语将“难民危机”“伊斯兰教化”“德意志传统丧失”等问题构建为威胁德国认同的制度性“他者”,从而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危机与民众焦虑中汲取持续性的政治资本。^① 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党的迅速崛起也在侧面反映出德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撕裂,这种结构性撕裂为选择党提供了制度缝隙与危机化叙事的空间,选择党通过成功地构建“反建制”的政治叙事,宣称自己为德意志传统的守护者。因此,选择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的历史性突破,是受益于德国社会近十几年出现的各类危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民众对政治经济结构中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的极度不满。

这也进一步说明,选择党的迅速崛起不能仅用政治投机来解释,而应将民粹主义置于民主国家的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与理解。传统民粹主义理论的研究多是从现象与社会反应角度进行分析的,但是选择党作为一个“运动党”是在不断调整核心议题的叙事中持续发展壮大的,这种通过不同时期危机进行自我重构的现象并没有获得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因此选择党的出现与迅速发展为民粹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样本案例。在这一意义上,对选择党的研究不仅是对其政治实践的考察,更是对现有民粹主义理论解释力的一种挑战与补充。

二、从经济保守主义到民族主义:选择党的早期叙事转向

(一) 反欧元话语与经济保守主义的崛起

选择党最初的建立是对德国主流经济政策话语中技术官僚权威的系统性挑战。2013 年德国经济学家伯恩德·卢克等人创立了德国选择党,其成立直接回应了 2008 年欧债危机后德国社会对经济治理方式的分歧。德国政府当时以“共

^① Christoph Bitzl and Michael Kurze, “Rechtsextreme Muslimhetze: Die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Religion als Vote-Seeking-Strategie der AfD,”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Bd. 5, Nr. 2, 2021, S. 471 ~ 502.

同货币稳定”为政治正当性,向希腊提供欧元援助,强调欧元区经济稳定的重要性。^①然而,这种精英政策却引发了德国社会中产阶层以及中小企业主的强烈不满,他们强烈指责德国政府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承担了过度的责任,并认为德国民众不应该为其他国家的失误而买单。选择党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焦虑的情绪中应运而生,其早期核心叙事并非直接诉诸极端民族主义,而是以卢克教授为代表的保守经济学家对欧元政策与货币一体化机制的批判。卢克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规制失灵提出明确质疑,主张重建德国的财政主权,并将德国纳税人的利益作为最首要的关切议题。卢克明确指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欧洲稳定机制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债券购买计划均已逾越其初始授权,构成了对市场原则和货币独立性的结构性侵蚀。^②尤其是在对债务国家的救助机制中,选择党指责欧盟的货币制度使德国成为财政转移的输家,德国缴纳的巨额资金被用以填补南欧国家财政赤字的窟窿,从而严重损害了德国纳税人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选择党构建了一个具有显著道德色彩的政治叙事,强调南欧国家的财政危机并非结构性经济转型困难所致,而是源于其缺乏财政纪律、官僚腐败和非理性消费等政治文化与道德败坏所导致。这种叙事模式与“经济文化道德论”类似,即将宏观经济问题归咎于“他者”的文化道德缺陷,而非制度失衡或全球市场结构变化。这种二元道德经济论强化了“高道德的北方”与“堕落的南方”之间的叙事鸿沟,并使得选择党能够通过“我们”即勤奋的德意志人与“他们”即南欧享乐主义者的二元对立,赢得选民的共鸣与支持。^③例如,在 2010 年至 2013 年间,德国主流媒体普遍以带有民族偏见的方式报道希腊,将希腊政府描绘为“腐败”,将其民众刻画为“懒惰”,强化了刻板印象与负面叙事。美国学者马塞尔·莱万多夫斯基指出,这种“文化他者”的叙事性传播为选择党的兴起提供

① 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Branislav L. Slantchev,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1, 2018, pp. 1 ~ 31.

② “ECJ Goes Against EU Treaties in Allowing ECB Monetary Financing,” December 11, 2018, https://ecrgroup.eu/article/lucke_ecj_goes_against_eu_treaties_in_allowing_ecb_monetary_financing?utm_source.

③ David Bebnowski,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ufstieg und gesellschaftliche Repräsentanz einer rechten populistischen Partei*,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15.

了舆论土壤。^① 当卢克宣称“德国父母辛苦工作纳税,却要为希腊养老金买单”时,这不仅是一种财政政策批评,更是一种基于道德经济正义的批判,是对欧盟内部再分配逻辑合法性的全面否定。这一经济怀疑主义叙事迅速从学术圈延伸至更广泛的中产阶级与保守知识群体之中,并获得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基础。^② 同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欧债危机的制度性反思,为选择党的批判逻辑提供了理论资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确立的欧盟财政纪律与趋同标准在危机中被认为严重削弱,欧元区成员国普遍未能遵守条约规定,从而揭示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设计上的内在缺陷。^③

从理论分析视角看,选择党最初的政治动员可被视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的复合体。前者强调本国经济主权并反对跨国财政转移,后者则将建制派描绘为背离民众利益、将公共资源用于他国而不顾本国利益的政治精英。选择党对传统建制派和欧盟经济治理模式的批判,不仅植根于对金融主权和财政自治的坚守,也体现了把经济议题进行政治道德化的策略性转换。在卢克领导下的选择党通过构建道德化的经济失败叙事,将其经济保守主义主张有效地转化为对建制派合法性的系统性挑战。^④ 这种话语建构方式,既是对自由主义欧洲一体化理念的挑战,也是对现代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代议制失败的激进回应。

(二) 经济精英话语的衰落与民族主义议题的崛起

德国选择党建立之初以批判和质疑欧盟财政一体化的正当性为主要议题,以宏观经济学家卢克为代表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占据了党内的主要话语权。他们试图将反欧元政策、财政保守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相结合,实现有序解散欧元并恢复本国货币主权的经济目标。选择党的早期发展轨迹显示,经济精英尽管在

① Marcel Lewandowsky,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Protestpartei? Die AfD in der Öffentlichen und politikwissenschaftlichen Debatt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Bd. 25, Nr. 1, 2015, S. 119 ~ 134.

② Acemoglu Daron, Georgy Egorov and Konstantin Sonin,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8, No. 1, 2013, pp. 771 ~ 805.

③ Robert Grimm, “The Rise of the German Eurosceptic Party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Between Ordoliberal Critique and Popular Anxie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3, 2015, pp. 264 ~ 278.

④ Rafal Riede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Intertwining Relations,” *Przegląd Politologiczny*, Vol. 3, 2017, pp. 7 ~ 20.

危机时刻拥有议程设置能力,但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动员资源,其政治话语最终被更具情绪动员能力的种族文化叙事所取代。^① 例如,在 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社会更加关注更具舆论影响力的难民危机。但当社会公众对难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时,卢克依然坚持其经济保守主义议题,并拒绝将党内主要议题转向反穆斯林和反难民的民粹主义立场,其结果是被党内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派系所取代。弗劳克·佩特里所代表的民族认同派系主张通过种族、文化议题进行政治动员,逐步将党内话语从经济保守主义转向民族主义议题,并借助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反精英的议程实现了党内重组,并获得了党内激进派的支持。这一政治转向不仅吸引了更广泛的不满选民,也标志着选择党由一个经济保守主义批判型政党,转变为以民族主义议题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政党。卢克也被边缘化并于 2015 年退出选择党,其主导的经济话语体系也随之式微。^②

经济精英在选择党内话语权的边缘化体现了民粹主义组织结构中的根本矛盾,即专业知识主导的经济精英与群众动员逻辑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技术理性的代表者因缺乏文化情绪动员能力而逐渐丧失党内权力基础,而能够调动“本土文化焦虑”与“反建制情绪”的民粹主义党员,则凭借更强的身份政治话语权占据党内主导地位。选择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轨迹表明,尽管经济话语曾构成其合法性来源,但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下,保守主义经济精英被迅速挤压出权力核心,其动员组织策略和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塑。^③ 由此可见,选择党最初的经济保守主义政策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性支撑,而党内随后转向反难民的民粹化动员策略则迅速导致了卢克的被边缘化。以卢克为代表的党内精英在试图保持理性话语与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对基层话语的主导能力,同时也揭示出经济精英在面对政治动员逻辑时所面临的组织困局与被边缘化。

① Simon Franzmann, "Calling the Ghost of Populism: The AfD's Strategic and Tactical Agendas until the EP Election 2014," *German Politics*, Vol. 25, No. 4, 2016, pp. 457 ~ 479.

② Holger Lengfeld,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ine Partei für Modernisierungsverlierer?"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Bd. 69, Nr. 2, 2017, S. 209 ~ 232.

③ Achim Goerres, Dennis C. Spies and Staffan Kumlin, "The Electoral Supporter Base of 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3, 2018, pp. 246 ~ 269.

三、难民危机与选择党的政治扩张

(一) 危机话语中的“安全”叙事与制度性他者的建构

基于对 2014 年难民危机中对安全议题的政治化批判,德国选择党进一步发展壮大。2014 年叙利亚内战及中东地缘动荡所引发的难民危机成为德国选择党进一步扩张的一个外生性转折点。尤其在德国联邦政府决定开放边境、接收超过 100 万中东难民之后,德国国内舆论迅速围绕安全、文化认同与国家能力展开激烈争论。国家安全被重新定义,“安全”逐渐脱离了狭义的物理保障含义,转化为涉及民族文化、社会稳定与身份认同等更广义的概念。在此背景下,选择党有意识地将难民叙述为文化入侵的“他者”,并借助媒体叙事与政治修辞,建立起一个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结构:^①一方面是以难民为代表的“外部威胁”,另一方面则是被建制派精英忽视甚至背叛的“普通德国人民”。这种将建制政治与人民意志对立化的表达逻辑,构成了制度性“他者”得以被合法化建构的舆论环境基础。

这一动员策略不仅将难民问题嵌入到危机叙事的框架中,也将社会焦虑成功转化为各地方选举中的有效政治资本。例如,在 2015 年科隆除夕夜由难民引起的性侵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这种“治安危机”与“文化冲突”的叙事迅速成为各州选民情绪的核心关注点。^②正是在这一有关“安全”的危机话语构建中,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在 2016 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选择党赢得 24.3% 的选票,成为该州的第二大党派,仅次于基民盟。更为关键的是,选择党通过不断强化德国传统文化中的“被威胁性”叙事,使难民群体逐步被塑造为德意志传统社会中的“文化侵略者”。选择党通过对难民问题的再定义,不仅动员了原有的保守派选民,还吸引了大量对国家文化和福利

^① Alessandro Sola, “The 2015 Refugee Crisis in Germany: Concerns about Immigration and Populism,” SOEP-papers on Multidisciplinary Panel Data Research, No. 966,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2018.

^② “How New Year’s Eve in Cologne Has Changed Germany,” Der Spiegel, January 8, 2016,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cologne-attacks-trigger-raw-debate-on-immigration-in-germany-a-1071175.html>.

制度抱有焦虑情绪的中下阶层。^① 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党不仅强调难民对德国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系统的侵蚀,还将其建构为对德国文化、传统与安全的系统性威胁。从制度层面来看,选择党的动员策略也折射出代议制民主在应对突发危机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例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论代议制政府》中指出,代议政治的有效性依赖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与信任延续。^② 然而,2015 年难民危机作为一种外生性冲击,造成了主流政党的代表性与选民期望之间的严重偏离。德国联邦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而采取的难民接收政策,在大量民众看来是“替代性授权”的失败,引发社会不满情绪,从而为民粹主义力量提供了动员契机。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制度性他者”的建构并非仅限于文化或宗教层面,更涉及对民主制度运行逻辑的质疑与重塑。选择党通过强化对难民的负面符号化、挪用安全话语,并结合对传统代议政治合法性的怀疑与批判,成功地将难民从政策的被管理对象转化为制度对立面中的核心“他者”。这种制度性“他者”的建构路径,其合法性既依赖于对社会危机叙事的选择性放大,也根植于现代民主制度内部的代表性裂痕,在危机政治的语境中成为重塑政治边界与认同秩序的关键机制。^③

(二) 代表性真空与选择党的制度性突破

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选民与被代表者之间的信任纽带,这一纽带的核心在于政治体系能够对政治代表性进行有效回应。根据民主理论的经典观点,当政党在选举前后频繁更改政策立场,或在重大议题上未能作出清晰表态时,便可能削弱选民对其代表性与治理能力的信任度。^④ 特别是在突发性政治危机治理中,政策的快速反应能力直接影响政党能否保持对政治议题的主动权。选择党就是精准地把握了主流政党在难民与文化融会议题上的政治真空和反应

① Paul Marx and Elias Naumann, “Do Right-wing Parties Foster Welfare Chauvinistic Attitud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2015 ‘Refugee Crisis’ in Germany,” *Electoral Studies*, Vol. 52, 2018, pp. 111 ~ 116.

②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5.

③ Julika Förster et al., “Die AfD vor den Landtagswahlen 2016,” February 19, 2016, <https://www.otto-brenner-stiftung.de/wissenschaftportal/informationsseiten-zu-studien/studien-2016/die-afd-vor-den-landtagswahlen-2016/>.

④ Richard W. Krouse, “Two Concepts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4, No. 2, 1982, pp. 509 ~ 537.

滞后性,迅速调整政治动员策略,突出反移民立场与国家文化保护的政治化叙事,从而在德国政党结构中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另外,实证研究与民调数据还进一步揭示了主流政党在回应民众最关心议题方面存在结构性断裂。德国选举研究小组在 2016 年的调研报告中指出,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选民认为难民问题是当前最紧迫的政治议题。这一态势在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例如,各党派在 2016 年的选举中确实缺乏对“融合和难民”话题的深入讨论,其中,选择党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州选举计划中,大约 22% 的声明涉及难民议题。相比之下,社民党只有 11% 左右,绿党、基民盟和左翼党只有 7% 左右,自民党只有 4% 左右。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选举计划中从未将此类议题列为重点,这意味着这些德国传统政党在 2016 年制定州选举计划时几乎没有对难民危机做出纲领性反应。^② 也因此,在 2016 年的地方选举中,选择党获得了大胜,其中包括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此外,对于移民和融入问题的批判态度使选择党在黑森州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 11.9% 的选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赢得了 24.3% 的选票。在马格德堡州议会中,选择党则成为该州的第二大政党,得票率比基民盟仅少 5.5 个百分点。在随后的 2017 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12.6% 的得票率首次进入国会,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党,标志着其作为边缘政党向制度性参与者的转变。^③ 建制派政党席位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就关键社会议题作出有效回应,尤其在难民危机等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迟缓与回避,导致与选民之间的信任纽带持续弱化。选择党正是利用了这一政治真空,通过明确的政治立场与动员策略在地方

① “Ergebnisse der Bundestagswahlen in Deutschland von 1949 bis 2025,” Statista, March 14, 2025,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764187/umfrage/ergebnisse-der-aller-bisherigen-bundestagswahlen-in-deutschland/>.

② Matthias Kortmann and Christian Stecker, “Party Competition and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1, 2019, pp. 72 ~ 91.

③ “Bundestagswahl 2017: Vorläufiges Ergebnis,” Die Bundeswahlleiterin, September 25, 2017,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info/presse/mitteilungen/bundestagswahl-2017/32_17_vorlaeufiges_ergebnis.html.

与联邦选举层面迅速实现政治突破。选择党的崛起不仅反映出德国选民对传统政党政治结构的不满,更揭示了代议制民主在社会深层危机中所面临的制度性脆弱。

因此,政治代表性的流失并非仅由传统政党理念摇摆所致,更是政党系统整体对社会议题优先性变化回应机制失灵的结果。穆勒所构建的“代理人—委托人”模式在德国“安全”危机的政治语境中遭遇现实挑战,传统政党未能在选民最为关注的安全、融合与国家身份等议题上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进而被选民认为是背离了民意。更重要的是,传统政党代表性流失的问题并未随着难民议题的热度下降而减弱,而是在 2022 年俄乌冲突引发的新一波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的应对中,传统政党的反应依然迟缓,为选择党再一次掌握更广泛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空间。这表明,在议题性政治主导下,代表性的流失已成为德国政党体系中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而非短期策略失误。这一结构性困境不仅使选择党成为了“反建制派”叙事的代言人,也预示着德国未来政治版图将不断围绕移民、文化与国家安全等高度情绪化的议题展开持续演变。

四、选择党的民粹主义危机叙事

(一) 俄乌冲突与经济危机中的民粹主义政治重塑

2022 年俄乌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成为德国政治格局重塑的关键转折点,为选择党提供了新的政治动员契机。德国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当俄乌冲突引发地缘政治风险激增后,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价格急剧上涨,进一步推动德国的整体物价暴涨。至 2022 年 9 月,德国通货膨胀率达到 7.9%,为约近 70 年来最高(上一次接近这一水平是在 1951 年,通胀水平为 7.6%),也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最高通胀纪录。^①

在德国面对多重危机叠加带来的社会焦虑和政治不满的压力下,选择党敏

^①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WIFO), “Gemeinschaftsdiagnose #2-2022 Energiekrise: Inflation, Rezession, Wohlstandsverlust,” October 20, 2022, <https://www.wifo.ac.at/publication/70566/>.

锐地再次调整了议题设置和政策话语策略,将原本聚焦于反难民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议程,拓展至能源安全、通货膨胀与国家主权等关键领域。在具体政策层面,选择党多次公开谴责德国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立场,主张立即停止军事援助,转而将财政资源投入到本国社保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选择党在多个联邦州同时发起反能源价格暴涨的游行,并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因于执政联盟在外交政策上的误判以及绿色能源转型的失败。在经济政策上,选择党推进一种带有民族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民粹主义议题。^① 例如,选择党的议员强调,“德国正在为错误的意识形态政策付出代价”,并将通货膨胀归咎于绿党的能源战略和对外援助优先原则。选择党的联邦议员马丁·赖查特在联邦议会发言中直接将绿党称为导致德国陷入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并称德国前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外交政策让德国陷入更严重的外部危机。同时,选择党通过批评德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与工资制度,进一步强化其坚持国家应优先保障本国工人阶层利益的立场。虽然选择党表面上呼吁应落实最低工资制和减税提案以应对通货膨胀,但真正受益者实则为中高收入阶层。

选择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制造“危机化”叙事将社会不满情绪指向执政联盟,强调“德国优先”的政治正确性,并将本国公民与外来者、普通民众与国际主义精英进行明确切割。在工薪阶层收入受损、社会安全感不断减弱的语境下,这种叙事逻辑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效果,尤其在德国东部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响应。^② 总之,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成为选择党重塑其政治叙事、扩展其社会基础和选举版图的新危机叙事杠杆。选择党通过不断将安全话题进行政治化再叙事,构建起一种贯穿经济、文化与民族身份的复合型敌我叙事结构,在反对建制派、强调主权控制与本国优先的政治动员中,深化其作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主要载体的角色。这种策略体现了危机时代民粹主义话语自我调整的扩张性,即在传统议题基础上不断叠加新的矛盾冲突,以适应变动

① David F. Patton, “The Ukraine War as a Driver of Intraparty Conflict: Germany’s Left Party and the AfD,” *German Politics*, Vol. 33, No. 3, 2024, pp. 463 ~ 488.

② Sandro Moraldo, “Deutschland zuerst! und Prima Gli Italiani. Ein politolinguist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Wahlkampfparolen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 und der Lega,” *APTUM*, Bd. 17, Nr. 1, 2021, S. 112 ~ 145.

的社会焦虑和多层次的不满情绪。

(二) 绿色能源政策的危机化与社会化叙事

德国绿色能源政策的不断激进化演变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政治攻击的聚焦点。自施罗德政府时期起,德国以实现“碳中和”和推动“能源转型”为核心目标,在能源政策层面推行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其中包括生态能源税、“十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以及 2000 年引入的《可再生能源法案》,并确立了逐步淘汰核能和化石能源的路线图。^① 这一政策旨在将可再生能源逐步由原先的补充性能源上升为国家能源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能源供给结构的变化来看,这一政策性转型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1999 年至 2014 年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总发电量中的份额从 29 太瓦时跃升至 161 太瓦时,同时,核电发电量由 170 太瓦时降至 97 太瓦时,燃煤发电也呈现下降趋势。^② 然而,这种转型并非没有代价: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尚未完全配套的情况下,绿色能源提高了社会总成本,尤其在电力价格结构、国家补贴与终端用户分担机制上引发了一定争议;另一方面,2011 年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议会迅速高票通过《原子能法》第 13 次修正案,明确在 2022 年前永久关闭核电站,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对可再生能源与外部能源进口的双重依赖,从而使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③ 由于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稳定性上不如传统能源,在价格上也远远高于传统能源,激进的绿色能源政策导致德国一方面并没有完成可再生能源自给自足的稳定性转型,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于传统能源相对价格优势的依赖。

因此,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绿色能源政策的结构性脆弱被全面暴露。德国曾一度有高达 55% 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进口,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进口中断与能源价格飙升,引发连锁式的能源通胀与社会成本外溢。因此,“绿色通

① Staffan Jacobsson and Volkmar Lauber, “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Energy System Transformation—Explaining the German Diffu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Energy Policy*, Vol. 34, No. 3, 2006, pp. 256 ~ 276.

② Volkmar Lauber and Staffan Jacobss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onstructing, Contesting and Restricting Socio-political Space for Renewables - The German Renewable Energy Act,”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Vol. 18, 2016, pp. 147 ~ 163.

③ Marc Ruttloff and Peter Staubach, “Zweckwandel im Atomrecht: Zu 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von § 1 Atomgesetz,” *Natur und Recht*, Bd. 39, Nr. 12, 2017, S. 826 ~ 833.

货膨胀”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指责对象。选择党批判激进的绿色政策和脱离现实的精英愿景导致了国家的灾难,加大对绿党的指责和批判,进一步建构出一种将环保主义等同于政治敌人的叙事。绿色议题在建制派政党那里被视为具有普遍正当性的道德命题,但在民粹主义话语中,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议题反而被重新编码为“绿色精英”凌驾于普通劳动民众切身利益之上的象征性符号。选择党有效地利用了这种叙事,将绿色能源与生活成本、社会公正、国家主权等日常政治议题进行战略性再编码。^①在具体政治操作中,选择党将“绿色政策”界定为与民众日常生活利益发生冲突的意识形态,从而将其塑造为与普通民众利益相对立的政策:一方面,选择党在议会和媒体上强调“绿色政策”是导致电力成本飙升、能源供应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尤其指责绿党在能源转型中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另一方面,选择党通过提出“德国优先”的经济议题,主张削减对气候转型的财政补贴、取消碳税并恢复核能和煤电使用,将自身塑造成维护能源主权和民生经济的代言人。这一叙事策略尤其吸引了德国东部地区及能源密集型中小企业聚集区域的选民。在这些地区,家庭与企业对能源价格的变化更加敏感,对绿色能源附加费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表现出更强烈的不满。选择党通过组织反绿色能源示威、传播“绿色政策导致民众买单”的社会化叙事,使能源政策逐步从环保治理问题转化为阶层斗争与民生成本激增的社会争议焦点。这种去技术化、再政治化的策略,正是当代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即通过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人格化、敌人化,以制造清晰的道德冲突和政治对立。^②

此外,选择党并非一味否定所有的气候议题,而是在选项配置上回避碳中和的长期必要性与环境代价,将其定性为脱离现实需求的政治议程,主张应将国家资源优先用于德国人的能源供给和企业生产保障等,强调应优先解决德国现今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总之,德国绿色能源政策发展的结构性不足为选择党提供

① Markus Klein, “Die niedersächsische Landtagswahl vom 9. Oktober 2022: Eine Wahl im Zeichen der Energiekrise und des Konflikts um die Atomkraft,” *ZParl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Bd. 54, Nr. 2, 2023, S. 253 ~ 271.

② Stephan Pühringer, Karl M. Beyer and Dominik Kronberger, “Soziale Rhetorik, Neoliberale Praxis: Eine Analyse de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der AfD,” December 2, 2021, <https://www.otto-brenner-stiftung.de/wissenschaftsportal/informationsseiten-zu-studien/wirtschafts-und-sozialpolitik-der-afd/>.

了建构危机叙事的空间。通过对气候议题的政治再叙述,民粹主义话语成功地刺激了大众对生活成本与能源安全的焦虑,从而制造出一种高度情绪化与身份化的能源危机叙事。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在多重危机环境下,气候政治已从科学共识转变为政治对抗的焦点之一。

五、混合型民粹主义的制度化困境与组织悖论

(一) 危机叙事与政党制度化困境

选择党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与叙事,在德国社会转型与治理信任危机中成功获取了政治红利,并借此不断强化自身的存在感。然而,选择党的政治策略在本质上并非致力于制度性建设,而是高度依赖对危机的持续操纵与话语建构,因此其制度化建设始终存在根本性困境。选择党在组织形态与政策理念上不断制造新“危机”的策略,正体现了其与传统建制派逻辑的不同。作为一个“运动党”,选择党将自身塑造成德国社会自我救赎的代表,而非联邦议会体制内的稳定力量。这种路线导向使其在议程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选择性,尤其擅长在社会危机语境中迅速占据道德高地,塑造“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动员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政策细节的落地方面,选择党通常不会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诸如“公民工资”、非法移民对本国劳工的威胁、劳动法灵活性等议题,在意识形态层面制造强烈的价值对立。^①

另外,在意识形态结构上,选择党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双重投射的政治逻辑。一方面,该党借用自由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与公平正义的话语,对国家福利制度与经济政策进行激进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在文化与社会结构层面诉诸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如“秩序、祖国、家庭、服从”等。这种左右杂糅的意识形态并非基于可持续性的政治治理理念,而是围绕特定危机所构建的动员机制。例如,选择党

^① Roland Pichler, “Interview mit Alexander Gauland: Die AfD will als Partei der kleinen Leute punkten,” Stuttgarter Zeitung, April 25, 2016, <https://www.stuttgarter-zeitung.de/inhalt.interview-mit-afd-bundesvize-gauland-die-afd-will-als-partei-der-kleinen-leute-punkten.1915c96e-4687-4f28-9b5c-596fbc15cf2b.html>.

议员斯普林格提出的“公民工资”政策,表面上旨在保障劳工权益,但其政治逻辑是“难民无权瓜分德国人的福利”,强调种族文化的纯洁性,而非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① 选择党还在住房紧张、医疗资源紧缺、教育系统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上引导社会关注。例如,选择党在难民危机与俄乌冲突所引发的财政压力背景下,将政府财政紧张问题归咎为“难民导致德国住房紧张”“移民非法占用福利”等民族对立问题。这种宣传叙事策略有效地转移了公众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关注与诉求,将社会愤怒转化为种族与文化层面的怨恨,从而为自身在特定社会群体中赢得广泛支持。然而,这种以危机话语为支撑的政治模式也决定了选择党的结构性脆弱:首先,选择党在政策制定层面缺乏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因此难以在制度框架内构建稳定的执政能力,即该党无法承担起作为执政党的系统性政策落地的责任,其提出的诸如减轻税负、缩减福利国家等经济主张,与其工人代言人的形象存在结构性矛盾,难以构成协调一致的政策架构;其次,选择党高度依赖社会危机的再生产来维系政治动员的可持续性,一旦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周期,其危机叙事的投机性便可能丧失。^② 因此,选择党的制度化不仅受到建制力量的排斥,更存在内在的政治逻辑困境。正如社会学家克劳斯·德雷所指出的,选择党试图充当“新工人党”的角色,但其阶级诉求已被种族主义逻辑所取代,使其始终难以真正代表劳动阶层的结构性利益。^③

更需要强调的是,选择党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非为了制度改革,而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概念,根本上是对欧洲一体化、法治秩序、多元文化的系统性排斥。这种政治逻辑是一种寄生于危机之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即只有在社会危机叙事不断更新的背景下,选择党才能保持其政治生命力。总

① Hans Monath, “Arbeiter und die radikale Rechte: Die AfD macht die Unsichtbaren sichtbar,” Tagesspiegel, December 5, 2020,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die-afd-macht-die-unsichtbaren-sichtbar-6861760.html>.

② Alexander Häusler and Rainer Roeser, “Entwicklung und politische Verortung der AfD im Bund und in Nordrhein-Westfalen: Einblicke und Bewertungen im Vorfeld der Landtagswahl in NRW 2022,” Forena Diskussionspapier, February 14, 2022, https://www.forena.de/wp-content/uploads/2022/02/pdf_eg_FORENA_Diskussionspapier_1_2022.pdf.

③ “AfD und die rechte Gewerkschaft Zentrum Automobil: Wie Nationalisten Daimler unterwandern wollen,” Stuttgarter Zeitung, December 1, 2017, <https://www.stuttgarter-zeitung.de/inhalt.afd-und-die-rechte-gewerkschaft-wenn-dein-blauer-arm-eswill.59cfac1b-bcf2-4909-9a0d-bd48a6c47e44.html>.

之,选择党在危机政治语境下的发展逻辑展现出强烈的去制度化特征,其政策体系无法在协商民主和多元共识的制度结构中获得广泛合法性,而是不断依赖于对“他者”危机的建构。这不仅限制了该党制度化能力,也在本质上决定了它作为“运动党”的政治命运。因此,选择党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其能否成为执政党,而取决于德国社会是否继续在危机中不断徘徊。

(二) 制度内反建制的组织悖论

德国选择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在制度内反建制”悖论,这种悖论的核心在于:一个政党越是获得席位、赢得体制内权力,其作为“反建制”的政治动员能力就越受到结构性削弱。这种矛盾不仅体现为选择党从社会运动型政党向制度政党转变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困境,也体现在其意识形态整合与组织建构的深层困境之中。其中,选择党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双重性,为其组织整合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例如,2015 年后随着难民危机的加深、社会文化议题的政治化,选择党迅速由一个以政策批判为导向的“专家党”转变为一个情绪动员型政党,并在组织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分裂。以卢克为代表的建党派主张理性改革和保守的经济政策,而以佩特里等人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则将政党重心转向民族认同、文化保守与反移民立场。党内围绕“是走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还是民族保守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 2015 年卢克及其追随者出走,标志着选择党从建制内反对派走向了体系外动员力量。^① 这一组织转型虽然短期内带来了更强的群众动员力,使选择党在难民危机之后迅速获得民意支持、突破 5% 门槛,并在联邦议会中赢得议席,但从长远看,却使政党陷入了结构性矛盾之中,造成了党内路线的不断摇摆。这种悖论源自选择党行动逻辑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选择党需要不断制造危机性叙事,将政治议题危机化以维系其存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随着席次增加、政策参与度的提升,选择党不得不面对实际治理的责任,这使得其“反建制”的政治姿态难以维系。这一矛盾在各级议会、特别是联邦议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① Robert Grimm, “The Rise of the German Eurosceptic Party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Between Ordoliberal Critique and Popular Anxie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6, No. 3, 2015, pp. 264 ~ 278.

这种制度内“反建制”的悖论还体现在选择党内部组织结构上的分裂。在经历了2015年的分裂之后,选择党表面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叙事,但党内不同区域、不同派系之间的理念鸿沟却并未真正弥合。研究显示,德国西部选择党的支持者更多保持自由市场和欧元怀疑主义倾向,而德国东部的支持者则强调反移民、文化保守主义和德国认同等议题。这种地理上意识形态的差异则造成了选择党在组织统一性上的长期不稳定。^①例如,佩特里在2017年大选之后的突然退出,正是党内意识形态无法整合的直接体现。这种结构上的离散性也使得选择党难以像传统政党那样构建稳定的基层组织网络和选举动员机制,而更多依赖情绪传播与媒体冲突事件来维系存在感。

在选民构成方面,选择党的变迁同样印证了其选举群众社会基础的转移。早期以高学历、高收入精英为主的支持群体,逐渐被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社会安全高度焦虑的中下层选民所取代,特别是对移民持有强烈反对态度的东德民众。这使得选择党在面对政策议题时愈发依赖象征性标语和排外式的社会动员,而非专注于结构性改革。因此,当选择党进入议会后,其政策议题显得空泛乏力,充分暴露出组织战略与制度运行逻辑之间的脱节,特别是在面临德国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时并不能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选择党的政治悖论并非偶然,而是其在制度化与动员机制之间的悖论所导致的结构性后果。选择党越是进入体制,越难以维持其动员的道德制高点与群众合法性;越是争取选票,越难保持纯粹的反建制身份。这种组织上的边缘性维持策略,使其始终游离于体制与反体制之间,陷入不断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这种悖论既决定了选择党难以转型为执政党,也意味着它必须依赖危机政治的持续性来维系自身的存在价值。

^① Michael Jankowski, Sebastian Schneider and Markus Tepe,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Analyzing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Candidates’ Ideal Points via Black Box Scaling,” *Party Politics*, Vol. 23, No. 6, 2017, pp. 704 ~ 716.

六、结 论

德国选择党的兴起与扩张不仅是德国当代政治生态的一次巨大变化,也充分展现了民粹主义是如何通过危机叙事重塑民主制度边界的。对于选择党,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而是一个将反建制叙事转化为体制资源、以危机化语言构建现有结构的高效政治组织。实际上,选择党在每一次危机事件中都反复使用同一套政治操作逻辑,即将体制性治理失败简化为个体性道德失败,将系统性经济不平等转译为民族间的资源竞争,并借此重申其作为德意志民族代言人的合法性。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从能源危机到经济困境,选择党从不以政策制定者自居,而始终以体制内部的反对派自居,用危机政治获取民众支持,用排外叙事掩盖阶级压迫。正因如此,“危机”对选择党而言从来不是一种政治负担,而是其建构新一轮危机叙事的政治土壤。然而,正如本文在制度化组织悖论部分所指出的,民粹主义在制度化发展的过程中,终将面临内在政治逻辑悖论所带来的瓦解风险。选择党越是在联邦议会与地方议会中获得席位,越是要面对实质性政策讨论与治理责任。

例如,在新一轮政治调整与选择党危机叙事下,默茨新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德国的防务与财政政策取向。此前在 2024 年,为扩大军费开支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德国通过修改《基本法》放宽了“债务刹车”限制。默茨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诺将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此外,默茨政府还推动向立陶宛派驻常驻德军部队,以响应北约集体防御承诺,这些都标志着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角色的重大转变。^①然而,选择党迅速对这些举措发起批评:一方面,选择党指责执政联盟背离财政稳健原则,利用债务松绑为借口推动军备扩张,损害德国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选择党将德国在东欧的军事存在描绘为主动挑衅俄罗斯,会进一步激化德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紧张,为未来的战争风险

^① “The Bundeswehr in Lithuania: Major Steps Towards the German Manoeuvre Brigade,” Bundeswehr, June 13, 2024, <https://www.bundeswehr.de/en/news/bundeswehr-lithuania>.

埋下隐患。可见,选择党又试图构建新的国家安全危机的叙事,将默茨政府扩军政策叙述成进一步激化地缘政治矛盾的危险行为。由此可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德国内部危机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这也给了选择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

如果说21世纪初民粹主义是对精英政治合理性危机的回应,那么如今,民粹主义更像是将危机本身转化为政治动员机制的实践逻辑。德国选择党的快速崛起揭示了民粹主义在欧洲发展的三重根源性的逻辑:第一,区域不平等与社会断裂的现实基础。两德统一后的东部边缘化困境为选择党提供了稳固的动员土壤;第二,跨国危机与民族主义资源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联动机制。从欧债危机到俄乌冲突,民族中心主义不断被看作是能够获得更广泛支持的政治动员捷径;第三,德国主流政党存在危机应对失效的结构性漏洞。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他们在危机应对中的反应滞后与官僚化,最终促使选择党成为了最能回应社会焦虑与民生诉求的政党。2025年初,联盟党提出限制移民议案时,选择党的全面支持恰恰标志着其不再是政策提供者,而是议题设定者。这一转变更体现了主流政党向右靠拢的趋向,使得德国政治生态面临长期保守化和两极化的风险。因此,要真正理解并回应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仅靠抵制其议题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要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恢复公共政策的代表性与包容性,重建政治的道义与技术正当性。这才是破解制度内反建制悖论的根本出路。